

中央编译出版社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超越解构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

[美] 大卫·雷·格里芬 David Ray Griffin / 等著
鲍世斌 / 等译 曲跃厚 / 校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超越解构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

[美] 大卫·雷·格里芬 David Ray Griffin / 等著
鲍世斌 / 等译 曲跃厚 / 校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Peirce, James, Bergson, Whitehead, and Hartshorne by David Ray Griffin et al.

© 1993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本书中文版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美)格里芬等著;

鲍世斌等译;曲跃厚校.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0

ISBN 7-80109-496-4

I. 超… II. ①格…②鲍…③曲…

III. 后现代主义-哲学学派-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6055 号

超越解构

[美] 大卫·雷·格里芬等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cctp_edit @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2 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代译序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及其依据

王 治 河

后现代主义这一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文化思潮已愈来愈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兴趣,随着这一思潮在海外的不断发展,我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文献也在日益增多。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主要不是由于它“声势的浩大”,而是由于它思想的新颖与独特,也是由于它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与我们今日人类(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都是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可惜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主要侧重于后现代主义的摧毁、解构、否定性向度上(我的《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围绕这一向度展开的),对于后现代主义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的、建构性的内涵,也就是说对于它的建设性的向度则鲜有考察,以至于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上多少业已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后现代主义是专讲“摧毁”和“否定”的,因此是否定主义

的、悲观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许多批评文章也都是在这一思维定势上立论的。在我看来,这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把后现代主义这一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 and 理论内涵”的重大思潮简单化了^[1]。

后现代主义的向度是多维的。从大的方面看,至少可以分为解构性和建设性这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向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思想家最推崇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活动,最推崇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的人。在本书主编大卫·雷·格里芬看来,“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2]著名后现代思想家C.德勒兹也认为,哲学活动就是创造概念。伟大的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新概念的创造者。据此,他表示了对“哲学的终结”观念的不满。在德勒兹看来,哲学终结观念的提出,是哲学家缺乏创造力的表现。现在要做的是去开辟新的领域,进行新的尝试。作为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福柯对创造更是推崇备至。他曾经谈到:他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将一张桌子、一棵树当作艺术对象,而却不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对象。在福柯的心目中,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此是最好的艺术品。这意味着在福柯看

来,生活的真正乐趣就在于创造。

后现代思想家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创造,而且身体力行,在自身的实践中也始终贯穿着这种可贵的创造精神。

福柯本人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研究哲学,而且大半生时光教授哲学,但他的哲学却并不讨论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通常所讨论的东西,而是研究有关疯狂、医学监狱和性的内容。但他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家、医学家、犯罪学家和性学家。他研究历史,但他却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所研究的历史并非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历史。正是他创造性地将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将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成功地结合起来,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知识型”、“知识考古学”、“权力”、“系谱学”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无一不显示出他思想的创造性。

德勒兹这位终生奔波在“思想高原上的旅人”,毕生致力于为哲学开拓一条新的思路。他自觉地跳出“纯哲学”的高墙,与非哲学沟通,与艺术沟通,从而激发创造的灵感。他一生著述凡30余部,涉及哲学、电影、戏剧、绘画、语言、心理分析、文学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有“电影哲学家”的美誉。与此相联系,他还创造出大量独特的概念和方法,诸如:“欲望机器”、“差异逻辑”、“茎块”、“精神分裂分析法”、“图解法”、“制图法”等。

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向度的另一个表征是对多元的思维风格的鼓励。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多元论的观念——事物有许多意义,有许多事物,一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是哲学的最大成就”。他这里所说的哲学当然是指的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来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本文,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所谓“解构”,按照德里达的界定,就是一种“双重写

作”和“双重阅读”。德里达就往往在人们认为是统一的本文中,读出不一致和混乱。以倡导视角主义多元论著称的德勒兹和加塔利,更是有意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和僵化。与传统思维从一个中心的概念进行操作,运用固定的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再现现实的思维路线不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析和研究是在多层面上进行的。他们经常有意地变动概念的层面,转换研究的视角。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二卷中,他们就开始引进与第一卷中使用的框架和概念不同的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甚至改变了写作的风格”^[3]。

后现代思想家对多元论的倡导是与他们对“本体论的平等”概念的信仰分不开的。根据这一概念,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一个人(不管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种思想(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一个实在并不比另一个实在少点或多点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有区别的东西,“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4]。

也正是这种对后现代的“平等”概念和“多元”概念的认同,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对话”的推崇。伽达默尔甚至将对话视作语言的本质和生命。后现代思想家所谓的“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它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本文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对话的本质并非是用一种观点来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之上,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达到一种新的视界。因此,真正的对话总是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为了使真正的对话得以进行,后现代主义主张开放,主张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以防人微言轻的悲剧再度发生。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的第三个表征是倡导对世界的关爱。格里芬强调他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具有三大特征。其一,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相反,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在格里芬看来,“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他(她)只是借助这些属性同其他的事物发生表面上的相互作用,而这些事物并不影响他(她)的本质。相反,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5]其二,与二元论的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在世界中如同在家一样。由于这种家园感和亲缘感,现代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其三,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它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这种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救“正歪歪扭扭地、毫无意义地走向人种自杀”的现代人的尝试的第一阶段,应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恢复生活的意义和使人们回到团体之中。这种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生态主义”和“绿色运动”,因为它所倡导的“内在关系”理论、“有机论”以及对时间的新关系在“生态运动”和“绿色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里芬说“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格里芬的后现代主义便致力于倡导、推进这种后现代的生态意识。

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在这里是想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因为,如果我们把世界看

作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接人待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的依据何在呢?

首先,它源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性。正像人们日益意识到的那样,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并非某几个心血来潮的思想家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既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思,又是对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的回应。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时代哲学,而作为一种时代哲学,它势必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将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于自身之中。而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也是最强的时代之音就是对创造的呼唤。这一呼唤不可能不反映在后现代哲学中。

其次,它源于后现代思想家大都是“操心之人”。他(她)们既不是玩世不恭的颓废派,更不是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狂人,而是一些严肃的思想家,是一些操心人类命运、具有古道热肠的人,是肯担待的人。这些从福柯下面一段话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他说:“今天的哲学——这里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用以向它自己施加压力的批评工作,那它又是什么?它要不是在于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去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那么它的意义究竟何在?”^[6]后现代思想家不仅是“操心之人”,更是直面现实的人。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污染这两个

“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并试图解决这些难题。正是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于人类今日的不幸，现代性（主要是现代的思维方式）难辞其咎。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格里芬要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7]

最后，它源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既爱又恨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包括传统）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 ambivalent（既爱又恨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它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是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种“既爱又恨”的关系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否定不是机械的否定，而是某种程度的“辩证否定”。也正是这种“辩证的否定”造就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生成力和积极的建设性。能不能找到第三条路：既实现现代化又有效地避免现代化的弊端？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然，问题的难度是不小的。但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英雄就是坚忍地“游刃于两种对立之间的人”^[8]。

※ ※ ※ ※

大卫·雷·格里芬主编的这部《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是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推出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哲学家有些我们比较熟悉（如柏格森、詹姆斯），有些则不太熟悉（如皮尔斯、哈茨霍恩）。但无论我们熟悉与否，这些哲学家都堪称哲学上的巨匠，而且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重要源头。他们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乃至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过程研究中心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其创立者是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雷·格里芬。该中心现有 1000 多名会员,是世界性的以研究怀特海哲学为基础的过程思想研究中心。倡导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和内在关系概念之上的过程思维,寻求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它的主要宗旨。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旨在推动中国的过程思想研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其目前的主要工作是通过翻译、出版过程哲学的主要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将过程思想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将中国的过程思想和中国过程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方。目前,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翻译和出版的著作有:大卫·雷·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精神》、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雷·格里芬撰写的《过程神学》以及这部《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以上著作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即将出版的还有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哈茨霍恩的《创造的综合与哲学的方法》、小约翰·B.科布的《后现代公共政策》和大卫·雷·格里芬的《后现代宗教》等等。我们相信,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过程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会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注 释

- [1] R. Tarnas, *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 Ballantine, New York, 1991, p. 395.
- [2] D. Griffin, "Peace and Postmodern Paradigms", in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David Griffin,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 149.

- [3] 参见 S. Best and D.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Guilford Press, 1991, p. 104.
- [4] *Michel Foucault — Politics,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 – 1984*, L. D. Kritzman, ed. Routledge, New York, London, 1988, p. 328.
- [5]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David Griffin,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 14.
- [6] M. 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3 页。
- [7]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 [8] R. 罗蒂:《海德格尔、昆德拉、狄更斯》,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0 期。

目 录

代译序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及其依据	王治河	1
---------------------	-----	---

导论：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

大卫·雷·格里芬 撰 鲍世斌 译	1
一、后现代主义和理性	1
二、现代心一身问题与反理性	6
三、现代性对一种机械论的自然的认可	10
四、作为后现代假说的泛经验论	14
五、拒斥感觉论者的知觉观	20
六、超越极端相对主义的反基础主义	33
七、上帝、真理和价值	41
八、关于本书的几篇论文	43

第一篇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彼得·奥克斯 撰 毛剑平 译	60
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皮尔士的反笛卡儿主义	64
二、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皮尔士早期的实用主义	70
三、从现代实用主义到后现代实效主义	79
四、皮尔士的后现代主义原则	89

第二篇 威廉·詹姆士

马尔库斯·P. 福特 撰 程丽媛 译	123
一、对现代哲学的概念破除	125
二、后现代科学与宗教	144
三、詹姆士的真理实用论	161
四、社会哲学	169
五、结论	175

第三篇 亨利·柏格森

皮特·A. Y. 冈特 撰 游悦 译	183
一、导言	183
二、早期二元论：内在自由与外部空间	186
三、记忆和一种新的物质观	188
四、灵魂和超心理	195
五、创造的进化	196
六、本能和直觉：人性在进化中的地位	198
七、柏格森的宗教社会生物学	201
八、开放的社会/能动的宗教	206
九、几个异议和某些回答	210
十、对一个后现代世界的兑现价值	213

第四篇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小约翰·B.科布 撰 蒋芝英 译 227

一、思辨的后现代主义 227

二、现代性和理性 229

三、从具有各种属性的实体到关系中的事件 234

四、从主体和客体到主体—客体 239

五、从感觉的第一性到物理的感受 245

六、从概念相对主义到符合论 249

七、从宗教的隔离到其扩张 256

第五篇 查尔斯·哈茨霍恩

大卫·雷·格里芬 撰 梁红艳 译 269

一、现代哲学 271

二、泛经验论和彻底经验论 275

三、有神论、泛经验论和深层经验论 289

四、明确的形而上学信念的实践意义 302

译后记 316

导 论 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

大卫·雷·格里芬 撰 鲍世斌 译

一、后现代主义和理性

当前,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类型被称为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在一种类型中,偏重的是解构(deconstruction);而在另一种类型中,尽管也施行了很多解构,但偏重的则是建构(construction)。后一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直被正式地称为“重构性的”(reconstructive),以便更清楚地表明预设了一种解构性的要素。总之,这两种类型的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两种哲学中的哪一种更有理由被称为“后现代的”,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每一方都可自称享有使用该词的优先权。

一方面,在哲学界,“后现代”这个语词迄今为止大都与解构相关,而且这种用法一直与文学—艺术界中对“后现代”的用法密切相关。但如果问题是用法的实际优先(priority)而非优势(preponderance)的话,那么建设性的哲学类型或许可以要求优先权,因为早在1964年,怀特海(Whitehead)的哲学就已经使用了“后现代”一词。^[1]但是,优先权的问题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哪一种运动才是真正的后现代运动的问题。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藉此可以作出一种判断的中立观点。关于什么是现代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是现代哲学),特别是关于现代主义之可能受到抨击的那些方面(这也正是严格的后现代哲学试图超越的),每一方都有其自己的观点。当这些判断出现分歧时,每一种类型的后现代哲学都把对方看作是现代的,因为对方仍在接受那些被视为属于现代主义之可能受到抨击的核心的概念。当一方认为另一方不仅接受了这些概念,而且用它们得出了其逻辑结论时,前者会把后者判定为极现代的(ultramodern)、超现代的(hypermodern)和最现代的(mostmodern)。

例如,约翰·科布(John Cobb)在其后面的论文中指出,理性的观念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十分典型地将其视为现代主义之可能受到抨击的核心的主要部分。因此,这些哲学家便把怀特海和哈茨霍恩(Hartshorne)的哲学视为典型的现代哲学,因为这些哲学寻求提供一种符合自足的理性标准、并足以符合所有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宇宙论。但是相反,怀特海则把现代哲学(包括现代科学)视为一种在本质上反理性的运动。因此,根据这种观点,恢复理性的观念就会被认为是后现代的。而那些驱使我们成为反理性的而非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则可能被认为是超现代的,因为他们只是把现代主义